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术文丛

《论语》英译之 跨文化阐释

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

金学勤 著

A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NG CONFUCIAN ANAL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mes Legge and Ku Hung-ming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A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NG CONFUCIAN ANAL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mes Legge and Ku Hung-ming

**《论语》英译之
跨文化阐释**

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

金学勤 著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晶
责任校对:夏 宇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 /
金学勤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6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丛)
ISBN 978-7-5614-4458-0

I. 论… II. 金… III. 论语—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9440 号

书名 《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
Lunyu Yingyi zhi Kuawenhua Chanshi—Yi Liyage, Gu Hongming Weili

著 者 金学勤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458-0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500 册
定 价 27.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www.scupress.com.cn

代序



经典的跨文化研究

王晓路

各主要文化区域大多留存了一些书写的文化经典。这些经典尽管在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过程，然而其文化的意义却在于，这些经典在事实上持续影响着该地区群体的“知”与“行”所内含的文化品格和致思方式，它起着某种文化语法的作用。该群体的每一代人在面对其历史境遇中所出现的问题时，也往往会从那些留存的经典文献中挖掘思想的支撑点，或对这些思想资源加以重新解释，以便和现实的存在实行对接。传统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是历代知识人对该传统的持续理解和重新解释。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区域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对思想资源的借鉴，莫过于对经典的翻译和阐发。因此，某种经典，特别是那些得到公认、不断被“经典化”的文献，也会以种种方式影响到其他文化区域，而这种影响又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反作用于这些思想的发源地，由此构成思想文化的自我生长与外部催生。

孔子是春秋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说的一代宗师，在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举足轻重。他的思想集华夏上古文化



之大成，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部分。其《论语》无疑是一部最重要的经典。它以特有的文体阐发了一种整体的中国观念，即以“仁、义、礼”的概念范畴，沿着两条主线展开：（政治的）治人与（伦理的）修己；其核心部分之中庸说实际上也分为政治和伦理两个层面，而其关键概念“仁”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仁政，对他人的“忠”“恕”，同时也有对己的“克己”等实践性要求。这套观念系统在文化意义上可谓是开先河的。按照劳思光先生的说法，“孔子并非只知拥护一传统，而是依一有普遍性之理据，以建立其主张。此所以孔子表现中国文化自觉时期之开始。”^①

在历史的长河中，孔子的学说不仅逐渐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特有的东亚儒家文化圈，而且对欧洲和北美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就与孔子的思想在欧洲的传播有关。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霍尔巴赫、莱布尼茨、休谟、魁奈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孔子思想。这些思想家们在东西方智慧的交汇中，得以审视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理性、自然神论等一系列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美国文明之父”爱默生曾指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②

学术界对这样一部经典始终保持着兴趣是必然的。《论语》研究也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就中国学界的研究范式而言，其主要方式是将《论语》置于自身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内部和外部研究，以及将该部经典与其他经典并置进行的相关性研究，其

①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另参见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30页。

② www.wikipedia.org.



中既包括考据，也包含了意义的阐发等等，不一而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实际上，异域学界对此的译介和研究也有漫长的历史。如自17世纪初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东土算起，孔子的学说传到欧洲，迄今已400年，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不断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如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①、法国人顾赛芬（S. Couvreur）、德国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以及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等人，他们先后都将孔子的《论语》以及其他的经典著述翻译成欧洲语言。孔子等中国先哲对欧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些翻译所起到的作用。

在上述翻译中，最具学理性的当属理雅各的英译。理雅各（1815—1897），英国苏格兰人，曾被英国基督新教派公理宗的伦敦会派驻马六甲主持英华书院。该书院迁往香港后，理雅各随之迁居香港，任香港英华书院第一届校长。他从1841年起着手进行中国经典的翻译，相继出版了《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五卷，计八本，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诗经》及《春秋》《左传》等。1870年完成了《十三经》的英译。由于在中国典籍翻译方面成绩斐然，理雅各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1876—1897）。1879—1891年相继出版《中国经书》（*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六卷，包括《书经》《诗经（与宗教有关的部分）》《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等，1885年翻译出版《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1888年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翻译成英文。^② 由于他的翻译

① 参见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论著，*The Memory of Palace of Matteo Ricci*, Viking, 1984.

② 参见 www.wikipedia.org.



相对比较完备，所以时隔一百多年后，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时，依然将理雅各的译本作为《四书》的英译本。^①

迄今为止，《论语》的英译本已有近四十部，超过了任何其他外语的译本，也超过了儒家经典中任何其他典籍的翻译频率，足见西方对儒家哲学的关注程度和《论语》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其实在这些翻译中，也有中国人自己汉译外的努力，他们利用对英文透彻的把握将中国文化经典中的那些精髓部分诠释得更为精彩。文化怪杰辜鸿铭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获得学位最多的一个人，也是一位语言天才，不仅懂得9门外语，而且门门精深。林语堂先生曾言：“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②就理雅各和辜鸿铭的翻译而言，一些批评者认为理雅各在一些地方曲解了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其翻译行文生硬、句子冗长，与《论语》简练、含蓄之风格相去甚远；而辜鸿铭以高度“归化”之策略翻译儒经，英文流畅地道，然又“过”之太甚，“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等。将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英译本并置进行分析，透视并呈现两种译本背后的文化要素，显然是有意义的。因此，研究某一经典的方式还可以转换语境，将异域的研究成果纳入，从互为语境的方式见出其中的跨文化意义。

金学勤的博士论文即是从这一角度进入的。他在论文中提出，经典的传承和发扬有赖两种形式的翻译，一是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二是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前者

① 《四书》，（英）理雅各英译，杨伯峻今译，刘重德、罗志野英文校注，湖南出版社，1992年。

② 见张昌华“辜鸿铭的东西南北”，《曾经风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使一种文化传统得以从内部整合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时代，后者则赋予一种文化传统更为宽广的视角，使之在与其他文化传统的交流中既能以“他者”的身份审视对方，也同时获得了从“他者”之镜中观照和审视自身的能力。因而，研究经典的语际翻译对于了解异质文化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从具体文本的翻译入手，进行不同文化语境视角的审视，对于经典研究和跨文化理解也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

金学勤的论文简要回顾了17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及儒经西传（主要是19世纪前）的大致情况，分析了儒经西传之原因，并就《论语》其书及其英译历程作了纵向梳理，廓清了本课题研究所涉及之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理雅各和辜鸿铭着手翻译儒家经典的原因。然后，作者一方面从传统语言学视角论证了两位译者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在翻译过程和翻译最终成品上的显现，另一方面作者还考察了两位英译者对《论语》中最重要的几组概念的翻译，以寻求他们对《论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体系的整体阐释。当然，论文的问题和缺陷也在所难免。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本人浅见，自认为，若将翻译纳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学理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翻译本身，无论是汉译外还是外译汉，其中对表层结构任何层面的处理，如正反译、拆句、形象或意象的转换等等，均不是学理的论述，亦非思想的陈述，更不是一种对经验的解释，而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对处理语言编码艺术的归纳而已。因而，本人窃以为，凡以讨论翻译为题的博士论文，其学理性必须依赖于对翻译思想的研究和语句处理背后的跨文化理解和阐释等相关问题。金学勤的论文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金学勤君是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还一度分管了语言培训类的“小”行政。他进入这个领域也在知识结构上遇到了较大的挑战，需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系统地研读大量的文献。所以此学位持续了6年之久。“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本人相信，该书的出版是他在学术生涯中继续问学和思考的一个新的起点。

2009年1月



摘 要



文化经典是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宗教情感、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世界上任何悠久的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经典的传承和发扬有赖于两种形式的翻译，一是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二是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前者使一种文化传统得以从内部整合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时代；后者则赋予一种文化传统更为宽广的视角，使之在与其他文化传统的交流中既能以“他者”的身份审视对方，也同时获得了从“他者”之镜中观照和审视自身的能力。因而，研究经典的语际翻译对于了解异质文化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论语》作为系统地记载孔子言论的唯一著作，既是儒家之典籍，也是中国文化传统最核心的作品之一。随着儒家步入正统，儒家学说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孔子关于道德、政治、宗教、教育、人生等问题的观点对中华民族乃至东亚诸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自17世纪初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东土，正式将孔子的学说传到欧洲起，迄今已400年。这400年是中西方文明最大规模接触的时期，两者既相互冲突、相互排斥，又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其中，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始终是这一文化对话的中心议题和关注焦点。可以说，孔子在西方的遭遇正好是中国之西方形象的



缩影。

维多利亚时代，随着大英殖民帝国进入鼎盛时期，英语逐渐在全球普及，儒家经典越来越多地被翻译成英文。迄今为止，《论语》的英译本已有近四十部，超过了任何其他外语译本，也超过了儒经中任何其他典籍的翻译频率，足见西方对儒家哲学的关注程度和《论语》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研究《论语》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频繁的翻译，怎样被翻译，在西方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即是研究文化传统之间如何接触、对抗和理解“他者”，也是理解文化如何在交流中传承和发展自身；进而言之，就是理解处于文化中心的“人”与“人”之间——“我们”与“他们”——如何在同一世界上相互理解和接纳的问题。

本书以19世纪中后期出版的两个《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经典翻译中文化的阐释问题。一个是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的译本，另一个是中国清末民初有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被誉为“文化怪杰”的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译本。两位译者和其译作都具有代表性，同时也都颇受争议：理雅各的《论语》，像其庞大的《中国经典》系列译著一样，一个半世纪以来仍然被许多学者视为儒经翻译的典范之作；另一方面，很多批评者认为理雅各不仅严重曲解了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而且其翻译行文生硬、句子冗长，与《论语》简练、含蓄之风格相去甚远。辜鸿铭以高度“归化”之策略翻译儒经，英文流畅地道，然又“过”之太甚，“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等。

本书通过对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试图回答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语》（或儒经）英译的历史背景，包括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功利目标是什么？其次，《论语》是怎样被翻译的？这也是全文的重心所在。处于不



同时代、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译者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对文本进行解读，又如何对其进行翻译——或曰改写、转述、增删和言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是在何种作（译）者意图下使用何种翻译策略来化解翻译中文化的冲突问题的？第三，这些《论语》英译本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

本书在充分利用中西方传统译论中“忠实传意”和“再现风格”二元论讨论译本语言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功能主义翻译论中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勒弗威尔的翻译研究理论和加达默尔阐释学中有关“传统”和“前见”参与阐释过程的理论来分析《论语》的英译实践。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像任何人类行为一样乃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译者的目的和动机影响并制约着翻译的策略和具体方法，并进而影响最终的目的语文本之形态和接受状况。翻译研究学派把翻译和目的语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认为翻译受到除了语言转换之外的一系列因素的制约，翻译无疑是一种有目的的改写行为。这与“目的论”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强调译者、译作和目的语社会。然而，原作和原语文化在翻译中永远是不能忽视的，任何翻译都是阐释活动，文化经典的翻译更是对原作和原语文化传统的阐释。加达默尔的阐释学认为，纯粹理解文本所谓的真实意义的阐释是不存在的，任何阐释活动一开始总是受阐释者自身传统的影响和限制，基于传统的“前见”是阐释的前提。因为阐释者“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经典的开放性和阐释者背后传统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理解和阐释都受制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传统，因而也具有独特性。

本书认为，在《论语》的英译中，不同译者有着不同的翻



译动机和目的，这些动机和目的与译者翻译《论语》的策略和具体方法有密切联系。理雅各的“学术型”翻译和辜鸿铭所谓“有机整体论”即是如此。再者，译者背后的文化传统（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等），译者的教育和学养、性情、信仰；简言之，译者的文化立场构成了译者作为文化阐释者自身的“历史实在”，并直接参与文化阐释过程。因此，不同译者笔下的《论语》传达了不同的孔子形象和儒家学说形象。笔者通过对这两个译本的考察，探讨文化经典跨语际翻译中的跨文化阐释本质，这正是本书选题的意义所在。

本书共分7章。

第一章“绪论”详述了笔者选题之缘起、中外现有关涉《论语》英译之研究状况、理论视角和具体方法等。

第二章“儒经西传与《论语》英译”简要回顾了17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及儒经西传（主要是19世纪前）的大致情况，分析了儒经西传之原因，并就《论语》其书及其英译历程作了纵向梳理，廓清了本课题研究所涉及之历史背景。

第三章“《论语》英译之动因”详细探讨了理雅各和辜鸿铭着手翻译儒家经典的原因，指出理雅各翻译儒经（包括《论语》）之最初和最直接的目的服务于新教传教事业，最终为让中国人皈依基督世界铺平道路，其意向读者是传教士和西方有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入门学者；辜鸿铭则是为了传达儒家哲学和中国文明之精华，扫除西方对中国思想之歪曲和误解，并改变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之态度。笔者指出，由于翻译动机不同，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大相径庭。

第四章“文内比较：经义传达与风格再现”一方面从传统语言学视角翻译理论出发分析对比了两个译本在语言特征、忠实传意、再现原文风格，以及误解误译和根源等问题，本着功能主

义的翻译“目的论”原则，论证两位译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在翻译过程和翻译最终成品上有不同的显现。笔者指出，理雅各之《论语》以注释详尽、直译、复制原文句型为特色，这与其为传教和传教士翻译、注重最大限度传达经句意义为目的之译经动机直接相关；而辜鸿铭高度“归化”的翻译则缘于其“要像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那样说话”、消除任何“怪诞离奇”之感的原则。

第五章“核心概念英译与文化阐释”将语内研究和语外研究相结合，首先考察了两位英译者对《论语》中最重要的几组概念的翻译，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他们对《论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体系的整体阐释。翻译即阐释，笔者认为，作为《论语》英译者的理雅各和辜鸿铭无疑是孔子思想的阐释者，而他们对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阐释受到了各自身处其中的文化传统的限制，个人的教育、素养、宗教认同和文化立场构成了他们作为文化阐释者的“历史实在”，因而他们对《论语》和孔子思想的阐释也是不一样的。具体而言，理雅各对《论语》的理解体现了基督教中心主义的立场，不仅未能客观地评价孔子，而且其翻译加深了西方固有之误解；而辜鸿铭本着争取让中国文化之精华得到西方认同的良好初衷，用完全的西方式话语阐释儒家，虽然值得称道，但他的译本在无意中淡化了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成分之特性。

第六章“孔子与 Confucius：《论语》英译之影响”分两部分简要叙述了本书所涉及的两个译本在英语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是《论语》译本的直接影响，二是《论语》译本所塑造的孔子形象。

第七章“余论：经典翻译之悖论”就文化经典翻译的悖论作了探讨。笔者以《论语》为例指出，在文化经典的翻译上，



总是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简言之，译者的追求在“信与美”“同与异”“古与今”之间总是难以达到完美之和谐。

关键词：孔子；《论语》；英译；跨文化阐释



All the long-standing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have their own classics, which epitomize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religious beliefs, moral values and even principles of life of the people in these civiliza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se classics consist in two essential media, or two types of translation: one is intra-lingual, and the other inter-lingual. Whereas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enables the classics to adapt to the changed historical conditions within a given society, it is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 that provides a culture with a much broader perspective, from which a culture acts both as “the Other” to other cultural systems, and as “the Self” who is able to view its own image in the mirror of “the Other.” In this sense, the studies on the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classics have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essent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only book recording the sayings and discourses between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is a classic of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Confucianism remained the orthodox ideology in China for about 2,000 years, Confucius' ideas and views on moral cultivatio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religious sentiment, and human life, as recorded in *The Analects*, have exerted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nation and many other nations in East Asia. Since the early 1600s when the Jesuits first landed in China, Confucian classic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uropean languages, initiating a four-hundred-year period of encount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civilizations, a process of cultural confrontation as well a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uring which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have always remained one of the central



topics and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t is safe to say that Confucius' image in the West is that of China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miniature. From the beginning of 1800s, Confucian Classics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hich, with the rapid r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began to replace Latin and French and eventually grew into a global langua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30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nalects* and new versions are being published at shorter intervals. Indeed, *The Analects* has been translated more frequently into English than into any other foreign language, and, among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t boast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English versions. The fact that this little book has received so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West is itself something deserving our attention, for an inquiry into this phenomenon is to understand what really happens when one culture encounters another,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for that matter,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man"—between "we" and "they," both standing at the core of a culture.

This book chooses as its subject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published in 1861 and in 1898 respectively and explores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a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es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nalects* have been, since their publication, as controversial as the two translators themselves—James Legge, a Scot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y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Ku Hung-Ming, an extreme cultural conservative and a strong advocate of Confucianism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Legge's version is, on the one hand, still hailed by some scholars as a model